

「鸡鸣三省」的村庄

究竟在哪里

□ 姜继洪

1935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川滇黔交界之地召开了“鸡鸣三省”会议，作出了政治局常委分工、红军战略转移方向调整、中央苏区行动方针转变等三项重大决策。“鸡鸣三省”会议因此而成为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推动形成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一次关键性会议，成为中国革命伟大转折中的重要一环。

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没有发现这次会议记录的直接原始档案，学术界对于会议召开地点即周恩来回忆中所说的“鸡鸣三省”庄子究竟在哪里，众说纷纭。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数次派人专程赴川滇黔交界的岔河等实地实地考察调研，也未能明确具体地点，只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鸡鸣三省”庄子指三省交界附近、以岔河为中心的村寨。此后，不少学者特别是当地党史工作者经过研究，逐渐形成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说是贵州毕节林口迎丰村，一说是云南威信水田寨花房子，一说是四川泸州叙永石厢子。学者们将其概括为“川、滇、黔三说”。

迎丰村说的疑点是，查阅红军长征日记及1935年2月3日至5日期间的电报，尚未发现任何一处提到中央军委纵队到过林口，这表明“鸡鸣三省”会议不大可能在这里召开。花房子说的疑点是，根据伍云甫日记记载，2月5日“23时半才到”花房子，在短短的半小时之内不可能有时间从容地召开会议讨论一系列重大问题。花房子仅一栋三间开木房及一屋，不具备周恩来所说的庄子条件，不能满足中央军委纵队住宿所需。剩下唯一既满足中央军委纵队到过又符合庄子条件并且住宿过的，看来只有石厢子了。

石厢子说的理由的确很充分：当时石厢子有75户人家、400多人，满足周恩来所说的庄子条件；中央军委纵队在这里历时两个晚上一个白天，有充足的时间开会讨论重大事项，而且石厢子远离敌军，安全有保障，具备开会的客观条件。最直接的文献依据是钱江日记明确记载2月3日“到石厢子（鸡鸣三省），留驻一天”，这里的括号清楚地表明，在当时红军看来，石厢子就是“鸡鸣三省”村庄。但是石厢子说也存在两大疑点。一是石厢子距岔河太远，与“鸡鸣三省”地理特征不符；二是2月5日中央复项英这封至为关键的电报，只署了日期而没有发电时间，地点并不明确，很难说是石厢子。

关于第一个疑点，涉及如何理解“鸡鸣三省”地域概念。从这些年来的研究看，主要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狭义的“鸡鸣三省”，指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岔河。从地理位置看，岔河是最符合“鸡鸣三省”特征的。当时三省一侧各有一户人家，确实是一家鸡叫，三家皆闻。但是据时任

中央红军总部机要科机要员的李质忠回忆，“真正三省交界岔河那个地方总部没有去过”。另一种是广义的“鸡鸣三省”，指由岔河开始形成的分属三省的三面扇形山地。当地群众把四川古蔺县的水潦、石厢子一带（1962年划归叙永县），云南镇雄县的坡头、威信县的水田寨一带，贵州毕节县的林口一带，统称为“鸡鸣三省”。广义的“鸡鸣三省”概念，具有很大的包容性，长期以来为多方所使用。

石厢子到底是否属于“鸡鸣三省”，这需要通过历史文献及实地调研寻找答案。根据1944年威信县地图、1950年古蔺县地图、1954年美军陆军制图局绘制的25万分之一的中国地图，图示在四川境内的木瓦房村一带有滇属飞地存在。调阅云南四川两省关于这块飞地划界变更的往来公函，以及地方县志，查明：1935年的石厢子以西，为云南威信（扎西镇）水田乡的飞地木瓦房村。实地踏勘时，当地老人指证，石厢子场镇边上、毗邻赤水河北岸的凤凰山历史上就叫“鸡鸣山”，从凤凰山顶上向南不足1公里直线距离就是赤水河南岸的贵州毕节生机镇镰刀湾村，往西北不足2公里直线距离就是解放前的木瓦房村一带，凤凰山顶上公鸡一叫，贵州的镰刀湾、云南的木瓦房村都能听到。后来山顶上的人家迁到山脚下的石厢子场镇，所以明清时期的石厢子还有一个别名叫“鸡鸣三省”。

木瓦房村这块滇属飞地，揭示了当时真实的地理关系，为我们理解“鸡鸣三省”地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岔河为中心来界定“鸡鸣三省”。而历史上，还有以石厢子一带为中心的“鸡鸣三省”存在。石厢子今天确实不与云南接壤，但在历史上一度却是与云南毗邻接壤、与贵州隔河接界的“鸡鸣三省”之地。

关于第二个疑点，涉及中央书记处2月5日电报发电和接收时间。1935年1月30日、2月1日、2月4日、2月5日，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四次致电中央请示行动方针，“盼于即日答复”“请立复”。据时任红24师代理政治部主任袁血卒在新中国成立后撰写的《红军长征以后》记载：“1935年2月上旬，中央书记处给中央分局拍来电报”“中央分局接到电报后，立即在驻地井塘村召开会议，进行讨论”，紧急会议后在分局机关驻地“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文艺会演”“会演在晚上进行”。当年项英驻地的房东及井塘村群众在回忆中，均有过了年节后、春节后几天的公审、会演情况的记载。分析可知，1935年2月中央分局收到中央的电报一共有四次，分别是2月5日、13日、23日、28日。2月上旬中央分局在于都黄龙井塘村收到的电报只有一次，那就是5日中央书记处所发电报。收到这封“万万火急”的电报后，中央分局“立即在驻地井塘村召开会议”，符合当时项英及中央分局日夜期盼中央来电的情形。之后中央分局转移到于都南部禾丰地区，其他三封电报的收报地点是在禾丰。

由上述材料可知，苏区中央分局2月5日接到中央书记处电报后，立即在驻地召开会议，会后还举行了会演。从接到电报、通知开会、召开会议、会后会演等情况综合分析，中央分局接到中央书记处电报的时间，不可能太晚，至少是在晚上之前，大概率是在白天。由此倒推，中央书记处2月5日电报应该是在5日白天即已发出。再根据红军日记记载，5日离开石厢子后，一直在行军且有民间骚扰，中途不可能开会。还要考虑到，这封“万万火急”“先此电达”的电报，不大可能开完会后等到行军途中发出，它应该是开完会后立即发出的。因此，在没有更可靠的文献证明的情况下，目前的材料可以表明，“鸡鸣三省”会议在离开石厢子之前就已经召开过了，石厢子应该就是周恩来回忆中所说的叫“鸡鸣三省”的庄子。



香港同胞齐心抗战的历史见证

——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碑文敬读

□ 仇兴平

星，碑上刻着曾生将军手迹“抗日英烈纪念碑”，纪念碑基座横书“浩然正气”四个大字。纪念碑旁有两个矮身碑文座，用黑底金字刻录着烈士姓名，并用中英文题写碑文，记述了乌蛟腾村人可歌可泣的英雄抗日事迹。

（一）

抗战时期，乌蛟腾全村500多人，在东江纵队港九大队领导下，积极报名参加游击队，并协助做好放哨警戒、情报传递及宣传抗日等工作。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扫荡绞杀，乌蛟腾村民毫不畏惧，协助并保卫东江纵队在村旁的石水洞设立收发电台，前后隐藏了8个月，使得广东与延安保持联系。特别是1943年2月，在乌蛟腾村附近的山坡上，召开了被称为“东江纵队五大会议”之一的“乌蛟腾会议”，对指导东江军政委员会抗日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乌蛟腾村在守土抗日、保家卫国中付出重大牺牲，包括村长江世藩在内，碑中所陈的9名烈士献出宝贵生命。

乌蛟腾村的抗战是香港同胞抗战的一个缩影。在整整3年8个月的抗战中，香港各界同胞与祖国人民一道，同仇敌忾、携手齐心、共赴国难，为守卫家园、抗击日寇作出重要贡献。特别是我党领导的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一直坚持香港，带领香港同胞四处出击，参与大小战斗上百场，消灭罪恶昭彰的日本特务东亚芝及多名汉奸密探，歼敌300多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先后开辟12条营救路线，秘密营救包括何香凝、柳亚子、梁漱溟、邹韬奋、茅盾等在内的800多名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文化名人及家属。抗战期间，向盟军提供香港启德机场、西乡南头机场的图例及说明，营救英军被俘人员以及印度等国际友人89名，救护克尔等8名美国飞行员，涌现出了刘黑仔、方姑等一批传奇式抗日英雄。许多爱国人士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理优势，冒着生命危险突破日军封锁线，多次将捐献的资金、被服、药品等从香港运送到内地，有力支援了内地军民抗战。香港同胞的英勇行动，给在黑暗中苦苦挣扎的香港同胞以极大希望和鼓舞，同时也有力配合了全国抗战，乃至盟军在东南亚地区的对日作战。

（三）

伫立碑园、敬读碑文，抚今追昔、思绪万千。那些为香港、为祖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献出宝贵生命的英

雄先烈、仁人义士，值得我们深刻缅怀、永远铭记；那些先烈遗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和战斗意志，值得我们代代传承、永远弘扬。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香港同胞齐心抗战的中流砥柱。党在哪里，抗日的烽火就在哪里。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总督杨慕琦组织抵抗18天后宣布投降。此后的3年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担起历史重任，一直坚守香港抗战，其中乌蛟腾直接参加港九大队的村民39人。港九大队组织领导抗日斗争、转运急需物资、营救进步人士，成为香港地区引领同胞抗战的主要力量，也让香港成为抗战的重要支点，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当前，少数别有用心之人鼓噪历史虚无主义论调，无视党在香港的苦难奋斗，否定党在香港的历史贡献，对此必须高度警惕，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和拥护党的领导。

中华民族的血脉深情是维系爱国爱港的精神旗帜。香港自古就是中国领土，香港同胞始终与祖国人民同根同心、血脉相通。在艰难的抗战岁月里，乌蛟腾村正是怀着对中华民族的深厚感情，才能在日寇的酷刑逼供下毫不畏惧、坚贞不屈；香港同胞也正是饱含对这片土地的浓烈情愫，毅然挺身而出，积极支持和投身抗战。这深刻启示我们，一人一村一地只有始终怀揣爱国情怀、才能在灵魂深处扎下根脉，在情感上找到归属，在言行上找到坐标。香港永远是中国的香港，祖国好，香港明天才能更美好。

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是战胜一切敌人的制胜法宝。中华民族是从不屈服的民族。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深刻指出，社会是在矛盾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突出强调，斗争是一门艺术，要善于斗争。3年8个月抗战，乌蛟腾村以英勇的斗争有力反击了日寇十余次扫荡；香港同胞与祖国人民一道，以坚定的意志和果敢的行动，最终赢得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这深刻启示我们，对敌斗争是你死我活的较量。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任何敌对势力心存幻想、妥协退让，只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在斗争中



战胜敌人、赢得未来，求得生存与发展。

披肝沥胆的精诚团结是共克时艰的力量源泉。面对日寇的严刑拷打，乌蛟腾村村长江世藩誓死不肯透露游击队行踪，用生命守护战友安危；面对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香港同胞省吃俭用、节衣缩食支援全国人民抗战。香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纷纷采取各种形式支战参战，合力筑成抵御日寇侵略的钢铁长城。这深刻启示我们，民齐者强，上下同欲者胜。一个群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有众志成城、并肩奋斗的团结，能够想到一起、走到一起、干到一起，就能聚合征服一切困难的磅礴力量。

历史昭示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爱国爱港旗帜的大力感召下，特区政府、香港警队、爱国爱港力量将与近14亿中国人民一道，团结一致，同心守护家园，携手踏平崎岖。

（作者系驻香港部队政治工作部主任）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农村基层党建创新需增强“四个力”

□ 于忠珍

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基层党建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如何加强改善党的领导，创新开展基层党建工作，需要探索一条适合新时代要求的农村基层党建新路子，着力在增强“四个力”上下功夫。

强化组织体系建设，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党的领导是基层组织的“主心骨”，基层党组织建设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障。适应当前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革，农村基层党建改革创新，一是强化党组织引领，坚持标准化建设、区域化覆盖、全程化服务融合，大力推进农村基层党建建设，配套设置党建站、建立党委领导的区域党建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区域内村庄、“两新”组织、学校等党建工作资源，强化工作合力，形成区域化党建工作新格局，引领区域治理发展。二是采取条块结合、城乡统筹、区域融合的方式，打破地域限制，创新党建新模式，将原本分散的党组织联结为紧密的党建共同体。如按照强村带弱村、稳村联乱村和富村帮穷村的形式，设置“联村型”党组织，有效解决部分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三是加大村庄与“两新”组织、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等新业态、新领域党组织融合共建力度，建立“村庄+合作社/农业市场/企业”型党组织，有效推动党组织的组织优势、政策优势与企业的信息优势、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充分整合，推动各类资源共享。四是本着有利于党组织发挥作用、方便党员参

加活动、加快农业产业发展的原则，加大在各类经济和服务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的力度，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通过探索创新，实现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全覆盖，提升党的领导力。

加强“头雁”队伍建设，提升基层党组织书记带动力。村庄富不富，关键在支部，支部强不强，关键是支部书记这个领头雁、领头羊的带动作用。面对新形势，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重点是培养能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村党支部书记。实施“乡村振兴头雁工程”，着力拓宽选人用人视野，吸引优秀人才回乡任职。完善基层党组织书记的选拔、教育、管理、监督、激励机制，进一步改善队伍年龄结构、学历层次，打造好基层“带头人”队伍。建立农村党支部书记基本信息管理系统，健全全局中调整考察备案制度，建立健全县（市）镇两级联审机制，扎实推进村“两委”成员“二次体检”。鼓励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最大限度调动书记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其号召力、战斗力和带动力。与此同时减少内耗，提高党组织决策执行力。强化党员队伍建设，健全发展党员全程纪实制度，建立发展对象部门联审、轮训等机制，深化党员设岗定责和承诺践诺机制，扎实开展党员先锋指数考评，全面推行《中国共产党党员证》制度，对农村党员家庭进行挂牌，制定党员行为规范，引导

党员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锻造干事创业过硬队伍。

强化民主管理，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力。加强基层党建，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准确把握农村改革发展方向和全局的政治优势。一是要建立规范化乡村治理体系，打造党委领导下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统筹区域内群团工作力量，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打通乡村治理的“神经末梢”。二是实行民主决策制度化，着力推动党务村务决策公开，积极吸收村民代表或村务监督委员会列席党支部会议，对党内重要工作，广泛征求党员干部群众意见。凡需决策事项由村党支部提出议题，经村“两委”会议初步讨论后，提交党员大会进行审议，根据审议情况经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决策过程和结果全部公开，决策程序由村务监督委员会进行全程监督。三是实行民主监督常态化，持续加强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教育培训，不断规范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职责，推动村务监督委员会作用发挥。进一步扩大党务村务公开，对党务村务公开的时间、内容、形式、监督进行统一和规范，扩大公开的内容和形式，建立村监督组织把关、镇监督组织把关、市督查组织把关、社情民意把关、社会舆论把关村务公开模式，以党内民主带动党外民主，不断提高村级管理民主水平。开展村级审计督查试点，形成县（市）镇村三级审计督查和党务督查报告，建立健全村级审计督查规范化制

度，实现审计监督常态化、制度化。

强化机制创新，提升基层党组织经济发展力。提高基层党组织对于农民的动员和凝聚力，必须增强党组织带领村庄和农民致富的发展力。一是创新发展路径。创新“党组织+合作社/村集体/农户”土地运营模式，整合农村土地资源，通过镇级平台公司有效对接市场，利用市场化的手段吸引资本、人才、技术下乡，提升农业发展规模化水平，增强镇村造血能力，实现多方共赢。二是强化发展支撑。选派机关干部，进驻入村开展工作，深入村企业走访解决问题，推动乡村振兴。统筹乡村振兴工作队、第一书记等人才资源，下沉基层一线抓党建、补短板、促发展，推动各类人才向基层流动、在基层成才。三是建立融合化经济发展体系。扎实做好抓党建促产业发展、促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工作，把群众组织起来，深度融入市场，推动土地整合利用、产业融合发展，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推动农村经济质量提档升级。搭建企业沟通平台，建立党委成员联系区域内企业制度，定期开展走访，协助解决企业困难，营造安商、富商的发展环境。鼓励推动工商资本和优质资源下乡，实现要素合理流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